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丛书

The government rehabilitated anthropology as a discipline in 1978. Anthropology again establishe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such as the Chinese Ethnological Society, the Society for Anthropology in China, the Society for World Ethnic Studies, and China Urban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established departments of anthropology in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offering a major in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for undergraduates students, along with M.A. and Ph.D. programs. Research institutes were set up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its regional branches, including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y (Ethnic) Studies in and several provincial institutes located close to areas inhabited by ethnic minorities. University programs included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in Beijing, University, Zhongshan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and Xiamen University in Fujian. Recently Xiamen University closed its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while Beijing University established an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Thirteen regional colleges for nationalities have anthropologyists/ethnologists on staff but do not offer majors or graduate programs in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in China after the Rebuilding

学科重建以来的

中国人类学

王建民 汤 芸 / 主编

本书是部分中国人类学家就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发展状况发表的专题论文集。论文作者来自当代中国大陆最主要的人类学学术机构。他们在本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和研究角度反映了中国人类学最新的研究动向。在本书中，作者们通过区域性研究的追溯和学科发展史的回顾，对如何在中国建立和发展人类学的学科进行了讨论，借助学科史的梳理，来反思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基于各自在人类学不同分支的研究实践，说明了这些分支学科的最新进展。本文集将有助于读者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学科重建以来的
中国人类学

王建民 汤 芸 /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王建民, 汤芸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81108-610-2

I. 学… II. ①王…②汤… III. 人类学—中国—文集 IV. Q9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3033 号

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

主 编	王建民 汤 芸
责任编辑	宁 玉
封面设计	布拉格工作室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610-2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代序）	(1)
一、文集编撰由来	(1)
二、中国人类学学科定位	(4)
三、学科史梳理与争辩	(8)
四、人类学各分支的进展	(13)
回向“整体人类学”——以中国情景而论的简纲	(19)
一、问题与讨论	(19)
二、背景与反思	(20)
三、面向与整合	(22)
四、意义与展望	(25)
民族志“书写”：徘徊于科学与诗学间的叙事	(31)
一、“书写之椽”：一种民族志表述的反思	(31)
二、“事实之后”：一种民族志解释的思辨	(36)
三、“装饰之美”：一种民族志范式的困惑	(41)
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48)
一、时代的呼唤	(48)
二、民族志的若干要点	(50)
三、可借鉴的学科机制	(52)
四、我们的机会与选择	(53)
论中国场景下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	(57)
一、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相似性或相近性	(57)
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差异性	(64)

三、国家学科分类与学科归属	(75)
四、结论：差异和联合	(79)
近年来社会学硕士论文写作中的叙事转向	(81)
一、社会学研究生论文写作中所呈现的叙事转向	(81)
二、社会学研究生论文写作中叙事转向的原因分析	(85)
三、论文写作过程中凸现的教育问题	(91)
在文化对立与文化自觉之间	(94)
一、话题的提出	(94)
二、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对立	(96)
三、超越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自觉	(99)
四、如何处在文化对立与文化自觉之间?	(104)
中国人类学的自我反思	(108)
一、中断的反思——1949 年以前的中国人类学的 自我反思	(109)
二、接续的反思——1949 年以后中国人类学的反思	(125)
轨迹：学科创建以来中国人类学的四件事	(142)
一、起航：中国人类学会的成立	(142)
二、跨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	(144)
三、家园：《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人类学专栏	(147)
四、平台：人类学高级论坛	(149)
五、结语	(152)
东南人类学的发展	(153)
一、前言	(153)
二、东南人类学发展的各个时期	(154)
三、东南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议题	(160)
四、应用领域与近年来的发展及学术成果	(168)
五、结语	(170)
“汉语人类学”视野中的大理研究与再研究	(172)

一、“汉语人类学”及其学科意义	(173)
二、有关大理的两则人类学研究	(176)
三、以己身看他者的再研究	(182)
2006 年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报告	(185)
一、学科发展概况	(185)
二、2006 年主要成果和焦点问题	(186)
三、主要问题及趋势	(221)
论经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主题	(223)
一、学科发展轨迹：几个重要的历史分期	(223)
二、现阶段经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主题	(227)
三、经济人类学在中国	(236)
经济人类学与关于经济的人类学	(238)
一、什么是“经济”？——人类学的理解	(241)
二、什么样的研究属于经济人类学的范畴	(249)
三、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252)
四、整体文化比较：经济人类学的方法论视角	(254)
五、经济人类学的学科定位	(257)
六、互为主体性：启发与贡献	(259)
我所了解的历史人类学	(261)
一、无历史的人类学	(261)
二、有历史的人类学	(266)
三、对“新鲜事物拜物教”的省思	(271)
四、历史意识问题	(275)
五、三种社会形态	(282)
六、几种“历史感”	(284)
方位转换中的艺术学研究	(293)
一、概述	(293)
二、人类学对原始艺术的考察与认识	(295)

三、艺术人类学对原始艺术的认识·····	(306)
四、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艺术·····	(314)
五、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任务·····	(317)
六、艺术人类学研究所面临的挑战·····	(319)
七、结束语·····	(326)

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代序）

王建民

一、文集编撰由来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学科重建以来，中国人类学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从恢复学科设置、确定学科地位、建立学术团体、引进学术理论、进行田野调查、发表学术论著、培养学科人才，到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和对话，呈现出纵向发展和横向扩张局面，然而其中亦有诸多需要我们不断反思和检讨之处。在 2008 年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大会于中国召开之前，系统地梳理学科发展的得失更有必要。

2006 年 12 月 1 日至 3 日，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召开了“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首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三十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北京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近两百名相关专业研究生及爱好者到会聆听、学习。与会代表尽管人数不多，但却可以说是国内主要人类学教学与研究机构的学术代表，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而我们这次会议没有举行过于仪式化的开幕式和

闭幕式，没有安排冗长的官员讲话，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学术研讨之上。

在这样一个时刻，通过在这次会议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类学家汇聚一堂，进行了认真而务实的研讨，提出或者引发了许多值得大家共同探讨和思考的问题，也进一步说明了在学科发展进程中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志同道合的学术伙伴时常有一些交流的机会，互相介绍各自的研究，把近期研究的重点展现给大家分享，使各自越来越专门化的研究有所拓展，学习其他学者在理论、方法及民族志方面的最新成果。这种交流过程本身就是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两天的研讨会和许多其他重要的学术讨论会一样，是又一次规模不大但却颇为重要的人类学仪式。学生们在仪式中成长乃至蜕变，由一无所知的小毛虫逐渐蜕变为能够驰骋于学术天空的蛟龙；作为学科研究主体的学者们在仪式中巩固和发展各自的学术，既有个人的学术倾向和特点，又能够求大同存小异，保持对同行的欣赏，合力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在学术共同体建构的学科平台上进行交流，大家相互补充，使得学科能够更好地整合，也能够不断产生出学科创新点。要对话、要交流，就需要依赖于共同的符号体系、共同的学术语言，要有大家承认和遵守的共同学术规范。因此，学科建设就成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学科建设牵扯范围较广，按照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制定的国家重点学科评估相关文件规定，主要有学科水平和建设成效两个方面。学科水平包括学科方向的确定、学术团队组建、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国内外交流、学科环境建设六个方面；建设成效则涵盖凝练学科方向、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能力提高、科研能力提高、学术交流、条件改善六个方面。

从更具体的层面来说，参照 20 世纪前半期孙本文、吴文藻、

黄文山等人的建议，^①加之近年来的教学和研究实践，我认为，说到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就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理论的研讨。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包括学科重建之后的最初时期，主要是对国际人类学理论有系统地引进和介绍，随后则应当考虑到理论的不断追踪、更新和对话，以及如何在中国古代思想资源和当代田野工作中发掘新的学术思想资源。理论建设如果能够有更扎实、更深入的基础，学术发展更有学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延续性才有可能，才不至于将学科更快庸俗化。在学术引介及运用过程中，应当经常展开与国内外同行及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和深层次学术对话，不断开拓和深化研讨主题。当下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需要有更多的对话意识。二、方法的改进。通过学术基本训练和田野工作实践，对人类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不断进行改进。目前中国人类学界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从学术队伍整体来看，人类学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探讨已然相对缺乏，未能够普遍地以人类学学术规范去进行研究，更谈不上娴熟地把握人类学研究方法。三、资料的搜集。基于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不断丰富田野民族志材料，同时着力从中国历代文献（包括少数民族文献）资料中整理固有的人类学资料。部分人类学研究者受制于西方传统人类学强调共时研究而疏于历史性探索的模板，没有很好地挖掘和利用中国本土文献来充实对中国人类学问题的解释和分析。四、人才的培养。开展分工合作，调动国内外学术力量，开设各种人类学及相关学科课程，培养各个层次的学术人才，这些学术人才能够实现理论与田野调查材料的综合，能够在国内外学术沃土的浸润下从事独立的创新性研究。五、著作的编辑。撰写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的民族志，

^① 参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第279—289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编著具有国际视野、总结中国经验的人类学理论研究著作，编纂人类学教材、工具书、丛书、文库和普及读物。六、知识的应用。注意以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积极参与各类应用性课题的调查与研究，力求人类学知识能够解决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更好地为社会和民众服务。

这本论文集正是以此次会议发表的论文为主要基础编辑而成的，同时加入了已经提交论文却未能如约参加的杨圣敏教授、王铭铭教授、赵旭东教授、梁永佳博士等人的论文。大部分作者在研讨会之前已经递交了论文初稿，经过研讨和相互批评，作者们对论文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因此，我们相信，现在呈现出来的作品较之研讨会又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让人倍感遗憾的是，由于部分作者未及整理他们的高论，部分论文并没有能够全部收录到本论文集中。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研讨会上发表的西南民族大学的张建世教授、上海大学的张江华教授和张佩国教授的三篇文章没有能够收入本论文集。主要的考虑是这几篇田野民族志论文和论文集的主题略有差异，为了让论文集更为聚焦，不得不将其舍去。但我们已经将其中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安排在我们中心编辑的《中国人类学评论》中发表，以让更多的读者可以分享。

二、中国人类学学科定位

在学科建设中，面临着学科纯洁性与跨学科的统一性之间的选择，这也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否则就会进入到魂魂不知所至的“梦游状态”。做人类学研究的人如果想要在学术上有更大的作为，甚至想要取得被同行们羡慕的成就，就必须不断确立、调整学科的定位。学科的本体何在？学科在从业者心中到底应该在什么位置上？每个学者又怎样在学科体系中找到自己的立

足点？在这些问题上的思索就必然将人们引向与学术认同密切相关的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讨论。

在这次研讨会上，许多专家关注如何在中国建立和发展人类学的学科，既有区域性研究的追溯，也有学科发展史的回顾。徐新建教授建议对人类学除了生物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之外，也要有哲学人类学的关注，以避免使学科沦丧到形而上的、缺乏终极关怀的境地。他认为，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知识范式，人类学在中国主要以进化论为根基，强调英美的科学实证倾向，忽略了人类学自两希传统以来的哲学根底，因而导致更多偏重于社会学与民族学。因此若想对人类学学科定位有更明晰的判定，一定不能少了哲学关怀。不同国家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具有自己的特点，要追溯这种特点，认识不同学术传统的差异，就必须深入分析这些学术传统所受的不同哲学传统的影响。需要回向人类学的学理整体，关注哲学人类学，并由此发掘中国多民族经验中对人的研究，从而不仅仅对“汉学”和“少数民族学”，而是对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作出贡献。

田野民族志（ethnography）是近十多年来国际人类学界研讨最多的话题。彭兆荣教授聚焦于民族志“书写”，追述了人类学在科学与诗学之间的摇摆和选择。该文以民族志表述范式为“经”，以人类学所主张的科学以及对科学的反思为“纬”；以当代民族志所进行的热点问题“写文化”为切入口，对民族志叙事所包含的原初性“科学”原则的规定，到人类学家对于“客观事实”的态度以及获取材料的方法等叙事样式进行检讨；同时关注今天空前剧烈的社会变迁为民族志实践和表述范式所提出课题以及所面对的挑战，即如何以传统民族志叙事为基础，重新审视民族志原则，并创造出适应于后现代社会新的表述方式和调查方法。

高丙中教授分析了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中国人类学乃至社会科

学发展的意义，并由海外民族志实践对学科精致化和专业化倾向提出反思。今天的中国对于外部世界有着巨大的知识需求，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乃至世界的知识生产都呼唤着中国人类学者从内敛走向开放，从国内转向国外去进行实地调查，开展国外社会的民族志研究。关于国外社会的民族志，既是人类学的学科核心，又是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实力的基础。中国的社会科学需要借助西方成功的学科双轨制来证明自己也是以国际社会为背景的学术，而人类学的学者和学生则需要开始认真思考到国外进行田野作业的可能性和实施方案，在海外田野民族志实践中不断提高研究水准，深化研究深度，并由此参与到国际人类学学术讨论之中，取得更多的学术发言权。

无论从中国本土田野实践，还是中国年轻学者在国外的新探索都说明，田野民族志不仅是人类学家田野工作的最终呈现形式，更是人类学学科的立足之本，涉及到人类学知识的生产，通过表达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联性来确定学科边界。人类学家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学科已有的理论和方法提出自己的补充和修正。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人类学这样的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基本上是无法验证的。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历史学、政治科学、文学和宗教研究也不相同，其知识体系的构建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的亲身经历^①。“因为人类行为总是为他们自己对环境的解释所重构，而这个环境恰恰是人类置身其间的。”^②也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在《中国场景中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一文中，我们又重新从场景化的角度讨论了中国

① 古塔、弗格森：《学科与实践：作为、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载古塔、弗格森主编：《人类学定位》，骆建建、袁同凯等译，第1—4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

② Martyn Hammersley and Paul Atkinson, *Ethnography: Principles in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8.

当代学科体系中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而这样的一种讨论又是在学术史的视野中展开的。

在讨论中，胡鸿保教授以三校硕士论文为分析对象，对社会学硕士论文写作的叙事转向作了分析。他尖锐地指出，注重定量研究，用图表说明问题，用数据建构模型，强调理性、客观似乎是传统社会学主流教学实践与论文写作中的“金科玉律”。然而，在今天多元化的语境下，这一“金科玉律”正在遭到冲击。通过对近年来社会学研究生论文写作中的一个新的趋向——叙事转向的分析，分析了造成这种转向的原因：一方面是为迎合近年来对叙事理论的提倡，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现行的研究生培养体制密切相关。他认为，社会学学科研究的主流方法似仍应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然而，反观人类学学科建设，似乎应该有一个主辅的转换和重新结合，而不是简单地将人类学引向量化，或者完全鄙视定量方法的采用。

崔延虎教授则更多地考虑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由学术刊物论文统计入手对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多学科介入及其影响进行了讨论。这两位教授从写作和学术出版角度表达了对学科纯洁性的焦虑，建立学科的边界似乎成为实现学科认同的方式之一。许多研究者试图追求学术独立，但在学科重建以来的现实中，学术必然要受到各种权势关系的影响，包括政府权力和政策的导向、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大众文化的潮流等等，多种因素制约和影响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创造，影响着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进程。学术论文和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与当前受制于功利化的学术制度的研究趋势密切相关。在图书出版日益市场化的条件下，读者、图书市场、出版社、研究作品的作者之间保持着更加紧密的互动关系，学术研究难免会在互动过程中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关注学术写作与出版也成为总结和反思人类学的一个重要视点。知识（knowledge）与话语（discourse）可以被认为是凸显学科特征的

两个重要维度。话语提供了一个框架，调控着人类学意义的生产，使得意义可以被控制。

上述这些讨论可以引发在人类学定位方面更广泛的思考。特别在我国当前的大学体系中，人类学作为一个专业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学术自我与学科定位是紧密关联的。人类学家要明白自己学术实践的价值就需要确立自己的身份，应当理解在不同国家的权力体系中的他者与作为人类学家的自我之间的关系，进而将这种关系放到全球化过程中的学术权力关系中去思考。与此同时，人类学家的自我又受到学术话语系统和特定的价值、学术规则和既定的社会实践、知识生产的制度和学术文本环境的限定。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给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人类学带来一系列权威性的标记：客观、理性、规律、进化、原始、功能、结构等等。经过社会变革之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民族等概念替代了原有的框架，作用于被取消学科的民族研究工作者。学科重建之后，经过恢复和重建，原有的标记系统也重新放置到人类学武库之中。近年来，在反思人类学的冲击之下，旧有的标记已经开始动摇，情境、场景、个人能动性、主体间性等一些新的关键词进入了当代人类学家的脑海。

三、学科史梳理与争辩

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学科史的角度来讨论理论和方法的问题。学科史研究是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这种挑战性首先来自于研究者知识的积累。我们的学科有自己成长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条件，必然受到权力关系和各种环境的制约。在这样的眼光中探讨学科史，就需要广泛的知识背景，对学科整体有

较好的把握,涉猎大量的学术研究著作和其他各种资料,了解别人的研究成果,访问各地学术背景不同、学术观点各异的学者,然后将各方面的材料综合在一起,在历史叙述中阐述研究者的观点。近年来,随着学科的进展,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史研究中呈现出越来越强的问题取向。

在本论文集中,谢燕清教授将中国人类学家在民族—国家实践的救亡兴国的主题下的学术实践与人类学家所面临的学术道德危机联系起来。他对中国人类学的反思以1949年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这个界限之前,一些学者将边政学等同于西方的应用人类学,表现出很强的民族—国家构建意识。许多中国人类学家坚持了文化多样性原则,认识到盲目追随西方将危害中国民族国家统一的叙事。而在这个界限之后,中国人类学经历过改造,丧失了学科主体性,学术反思成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附从。1979年后的人类学学科重建,却又再次面临着国内政治和国际人类学双重附从性的困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科的本土化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口号被提出来,它的趋势是去政治化和规范化。

在会议讨论中,杨渝东博士从南京人类学地位的嬗变讨论入手,将学科史的思考进一步深化,也延续谢燕清已经提出的民族学人类学学术发展与民族—国家背景之间的紧密联系;潘蛟教授以族群概念进入中国学术领域的过程,讨论了中国学术与国际学科体系之间的关联性,结合中国场景厘清了对民族和族群概念复杂关系,提出了他本人对民族和族群概念的界定。学术理论史的追溯加强了问题讨论的深度,并引发出对人类学家学术定位的反思。

既然作为一个学科存在,人类学要能够建立和发展,就应当讲求学科的规范性。学术规范在人类学学科建设中应当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学科的规范化可以说是学科定位的基准,凭借这种基

准，人们才可能进行深入的学术对话。许多学者相信作为一个学科存在，人类学根本不存在某个地方或国家的属性，而应当是国际化的。想要做人类学学家就得遵守人类学的学科规范。人类学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学科认同是建立在相关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概念之上的。面对中国学科重建以来学科薄弱的状况，这种规范更有必要。

然而，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在遵守规范的同时，首先，由于人类学面对着多样性的文化，当我们有了较为明确的学科定位之后，田野民族志材料需要有能够适用于本土概念的解释，或者说有必要从田野工作实践中提炼能够反映当地文化逻辑的本土概念。其次，也有必要认识到人类学的知识体系就包含着权力和知识的支配关系，社会研究中的规则本身就是包括了文化能动性的分类实践，这种分类实践涵盖着人类学的实证主义、理性、整体论、人文关怀、文化相对论、信度和效度，以及文化、族群、生计方式、婚姻、家庭、亲属制度、政治组织、习惯法、宗教信仰、艺术和审美等等概念。人们由此确立和精心维护一个参照点，以标示出学科的正统性和学术著作的权威性，从而学术著作的作者的地位也得以确认和标榜。“学术讨论和研究者们创造的任何方法一样，都有强烈的政治效应，并代表了某个特殊社会特定时间的文化价值。”^① 因此，既然受制于学科规范的我们不可能独立于我们所研究的文化，我们的选择就应当是根据这种状况去确定我们所使用的方法、分类系统，以便在田野民族志中、在人类学研究实践中提出我们的独立见解。这样，又会提出学科本土化的诉求。

对于本土化，也有不少学者提出批评。有人认为，人类学中

^① 马克·J. 史密斯著：《文化——再造社会科学》，张美川译，第4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